

文
汇
纪
实
从
书

孤独的外来者

——大清海关总税务司赫德

赵长天 著

文汇出版社

文
匯
紀
實
從
書

赵长天 著

孤独的外来者

大清海关总税务司赫德

文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孤独的外来者——大清海关总税务司赫德/赵长天
著. —上海:文汇出版社,2003.8

ISBN 7-80676-344-9

I. 孤... II. 赵... III. 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 1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49729 号

· 文汇纪实丛书 ·

孤独的外来者

——大清海关总税务司赫德

作 者 赵长天
丛书主编 萧关鸿
责任编辑 何 璟
封面装帧 周夏萍

出版发行 文汇出版社

上海市虎丘路 50 号

邮政编码 200002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上海长阳印刷厂

版 次 2003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640×940 1/16
字 数 280 千
印 张 20
印 数 1—6000

ISBN 7-80676-344-9/I·083

定价 28.00 元

关于文汇报实丛书

纪实文学在过去二十年的发展状态,是任何文学样式在任何年代的发展无法比拟的。这令人欣喜,也令人忧虑。

欣喜的是纪实文学无论在内容的广度和深度,形式的创新和变化,出版的速度和规模以及读者的接受和反应都已经在文学界和出版界一马当先。忧虑的是过快和过度的膨胀容易形成泡沫,而泡沫是不会结出果实,留下种子的。

我们决定编辑出版这套丛书,是因为我们作为媒体集团旗下的出版社对这种介于新闻、历史和文学之间的样式有着“血缘”的关系,特殊的兴趣和资源的优势。

我们希望这套丛书将有丰富多样的题材和更丰富多样的色彩。传奇事变和热点探访,伟大人物和平民生活,历史追问和现实思考,文字特色和图像魅力,厚重份量和轻松感觉,能够熔于一炉,相得益彰。

一套丛书要形成自己的特色是不容易的,特别是在纪实文学这个领域里更其不易。我们的努力有待于读者的检验。

主编

目 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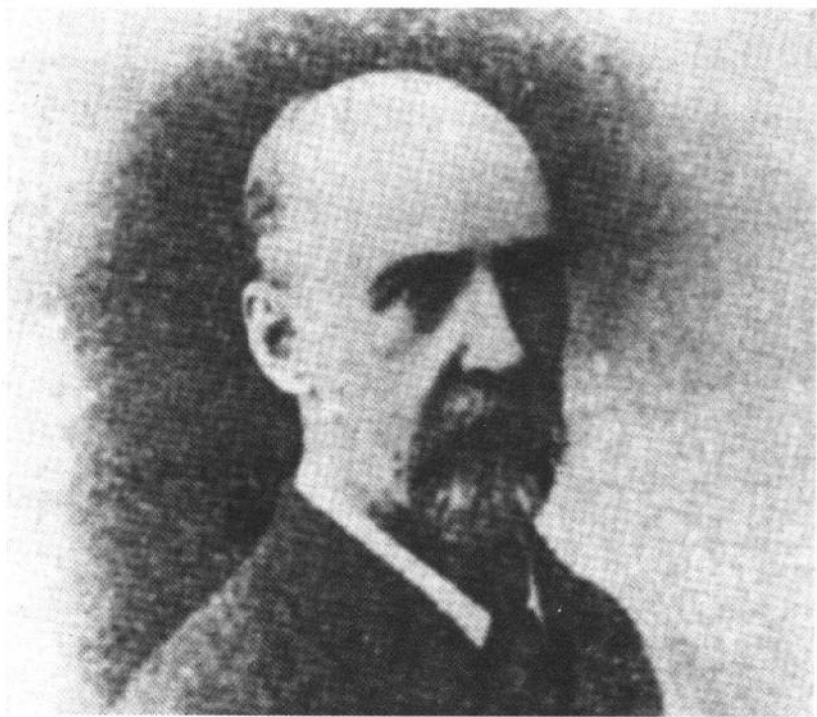
1	开场白
7	第一章 遭遇义和团
41	第二章 英国绅士
63	第三章 一边是英国,一边是中国
91	第四章 两个女人
105	第五章 关天海军的梦
127	第六章 低谷
141	第七章 “业余外交”
169	第八章 “扳道工”
189	第九章 儿子
219	第十章 变革和动乱
241	第十一章 暮年
273	终曲
277	附录:洋人控制中国海关始末
310	后记

开 场 白

和赫德相遇,很偶然。

在中国近代史上,这个爱尔兰人,应该占据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他是现代意义上的中国海关的真正创立者,同时开创了中国现代邮政和海务等事业。他在很大程度上掌握着晚清政府的经济命脉,又是中国和英国、法国、葡萄牙等国多次重大谈判的外交代表。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他退入舞台侧幕,在我们这代人的历史视野中消失了。

当然,隐约听说过这个名字,却朦朦胧胧,弄不清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他是鸦片战争后来到中国的英国(爱尔兰)人,自然啰,是个帝国主



赫德(1878年)

义分子,殖民主义者。我们的思维经常被一些似是而非的概念搅得很模糊,却对模糊的概念从来没产生过追根究底的欲望。所以,1998年当我由于一项写作任务接触到有关赫德的历史资料时,我非常吃惊。

多年写小说养成的职业习惯使我意识到,我遇到了一个特别的人物,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人物,一个值得为他写一本书的人物。

2

我正在走进一个人的生命。这个生命存在于一百多年以前,却似乎就在我的面前,伸手就可以触摸到。

这种感觉很奇怪。我是在读两个人的通信。这批来往信件(包括电报)多达8024封,持续了整整34年。在阅读达到一定数量之后,我感到空间和距离的消失。

3

过去,在读历史书的时候,我常常想,我所读到的,果真就是历史吗?历史学家们在编纂厚厚的学术著作时,依据的是一些什么呢?当然是有依据的,比如历史典籍、考古发现等等。但这些东西往往只是留下了一鳞半爪的历史印迹,真正客观真实反映生活原生状态的文字,实在不多。于是历史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就变成了某些人所理解所解释的概念,读起来就不那么踏实。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感觉到这批函电的珍贵。

这批函电因为一个特殊的原因已经全部翻译成中文并汇编成书,书名叫做《中国海关密档》。我相信,除了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学者,不会有更多的人关注这套书。因为这两个英国人来往函电的汇编,总计将近500万字,编成了厚厚的九大本。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谁有耐心有时间来阅读一百多年前两个外国人洋洋洒洒五百万字的书信呢?所以,中华书局1990年出版该书第一卷和第二卷时只印了两千册,到1992年出版第三卷又减至一千五百册。在藏书丰富的上海图书馆,这部书仅馆

藏一套,所以不准外借。(这仅有的一套书,看来也没什么人认真读过,因为在我阅读时常常发现有些书页被装订时的胶水粘在一起。)偌大一个中国,这样的发行量,自然不可能引起社会反响。

我由衷地觉得可惜。这些材料太珍贵了。因为它们是书信,是真正的书信而不是仿书信体的创作,就具有了创作的文字所无法替代的真实性。并且,这样大的数量、在整整 34 年里从不中断、每周不少于往返一次的频率,又如此完整地保存下来,就极其难得了。

函电来往的两个人,一个就是赫德(Robert Hart)。上海的常德路在 1949 年以前叫做赫德路。北京以前也有一条赫德路,在东交民巷附近。上海外滩现在竖立陈毅市长塑像的地方还曾经有过一个赫德的全身铜像,日本人攻占上海以后拆掉的。这些都象征着这个人在中国曾经有过的地位和影响。

从 1861 年到 1911 年,赫德在中国海关当了将近 50 年总税务司。总税务司,就是现在的海关总署署长;其职权,则比现在的海关总署署长大得多。一个人,连续 50 年主管一个政府的重要部门,就已经非常罕见了。一个外国人,连续 50 年主管着另一个主权国家的政府重要部门,就更加罕见了。我不知道在世界历史上,是否还有第二个这样的例子。

和赫德通信的是金登干(James D. Campbell),1833 年生于苏格兰的爱丁堡,长赫德两岁。金登干 1862 年起在中国海关工作,后成为赫德的亲信,于 1873 年被赫德任命为中国海关驻伦敦代表,担任这个职务达 34 年。赫德和金登干之间除 1900 年 6—8 月间因义和团运动,通讯一度中断外,34 年间一直定期函电往返。

4

在中国从传统的封建社会向现代转变的关键时期,赫德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他的人生履痕是一面镜子,从一个独特的角度记录了近代中国从封闭走向世界的最初脚印。当然,我感兴趣的,不仅仅是对这个人作出政治的评价以及通过他重读晚清历史;同时我关心这样一个人,一个外国人,一个在中国生活了几十年的外国人,一个作为中国政府高

级雇员的外国人,他由于特殊的地位、特殊的处境所带来的独特感受。

在特殊的环境中,人往往更容易表现出人性本质的一面。我试图以这些大量信件为基本素材,还原出一个具体的、真实的、活生生的历史人物。

在写作准备阶段,我阅读了大量论述晚清历史的著作和资料。我忽然觉得,对于中国来说,二十世纪的一百年,和十九世纪的一百年,居然有那么多的相似之处。

二十世纪,经过了无数的灾难和动荡,中国终于在七十年代后半叶走上了全面中兴的道路。二十年多年来,中国的变化有目共睹。如果把中国的近代史往前推移一百年,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开始的二十多年,中国发生过一些什么事情呢?

赫德的历史在某种意义上,是十九世纪下半叶中国对外开放史的一个注脚。

赫德是一个复杂的人物,这个人物在中国现代历史中的地位和作用同样是复杂的。他是个英国人,他是作为英国的外交官到中国来的,这种民族血缘关系决定了他会处处维护英国的利益。但是,从1854年到1908年,他在中国整整生活了54年,对这块土地也自然会产生一种特殊的感情。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除了洋务派官僚和外国传教士,海关的外籍税务司所起的作用是极其重要的。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一个资本主义的、高效率的海关,对腐败落后的封建王朝的国家机器,会产生多么巨大的冲击。

我不是历史学家。我想用一个写小说人的眼光,去裁剪现有的真实资料,画出一个具体的历史人物,并展示西方文明进入东方文明过程中的深刻冲突。奥地利著名作家茨威格说得好:“我丝毫不想通过自己的虚构来增加或者冲淡所发生的一切的内外真实性,因为在那些非常时刻历史本身已表现得十分完全,无需任何后来的帮手。历史是真正的诗人和戏剧家,任何一个作家都甭想去超过它。”

第一章 遭遇义和团

1

我从1999年为写作这本书开始搜集资料,大量阅读我能够找到的有关晚清历史的著作。2000年动笔写作初稿时我忽然发现,整整一百年前,1899年至1900年,中国发生了一件大事,这件大事震撼了全世界,也改变了中国的历史,那就是义和团运动以及随之到来的八国联军入侵。而我这本书的主人公赫德也深深地卷入了这场风暴,并在其中起了非常特殊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他对待义和团的态度,或者被人误解,或者被人歪曲。他在这段历史中扮演的令人难以想象的角色,大多数的中国人,则根本一无所知。

认识义和团运动这段历史,从中汲取经验性的营养,对于今天的中国极其重要。所以我决定打乱时间顺序,从义和团运动开始讲述这位英国人。

2

19世纪90年代后期,义和团陆续在山东和直隶,以练拳的名义兴起并迅速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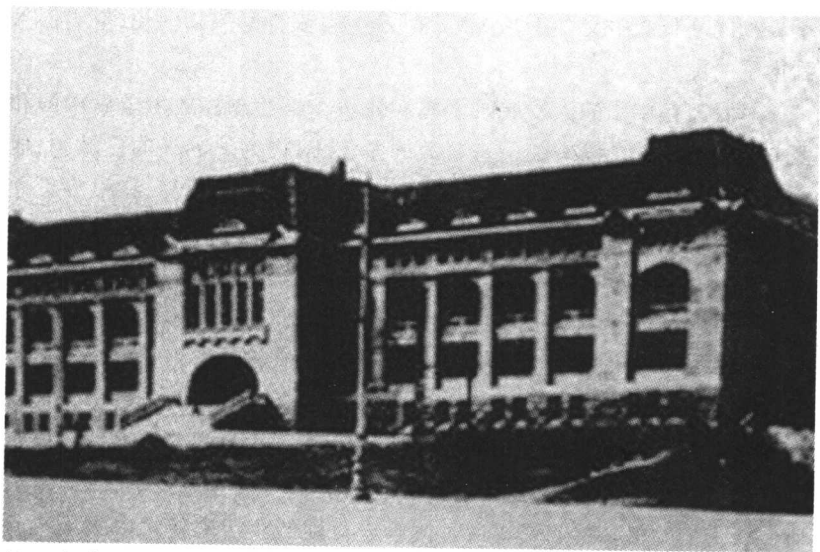
冀鲁地区向来有习拳练武的风俗,坊间本来就有不少武术团体;但武术团体和政治团体不一样。义和团是政治团体,政治团体的普及,需要政治的基础,有它的政治攻击的明确指向。义和团的矛头所指,是洋教。

1987年夏天,我曾经借住在浙江舟山沈家门一所基督教堂写作。早晨,听当地教徒用宁波方言唱赞美诗,有几分好笑,有几分好奇,还有更多的感叹和敬佩。难以想象,在偏僻的渔村,在穷乡僻壤,一个来自远方的外来民族的宗教,一种和我们的传统相隔老远的文化,居然能够冲破语言的障碍,被老百姓虔诚地接受。但基督教确实做到了,它经历了千辛万苦,包括义和团运动这样的风暴。

过去我们把外国传教士的活动一概定义为文化侵略,是过于简单化的做法。应该承认,大部分,至少相当多的外国传教士是抱着虔诚的宗



19 世纪末在中国传教的外国人



1900 年竣工的德国在青岛的总督府

教信仰而来。他们不是为了个人利益,他们深入穷乡僻壤,兴办学校医院,真诚地帮助普通的中国百姓。我们现在读到一些有关传教士的传记,还是会被他们的纯真信仰所感动。当时来中国的外国人很多,商人们来中国谋求利益,外交官和军人来中国谋求特权和让步,唯有基督教传教士到中国来不是为了获取什么而是为了付出;可恰恰是传教士,引起了中国人最大的恐惧和仇恨。

这是什么原因?

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教活动开始于16世纪80年代。最早被允许进入中国的传教士是意大利的利玛窦,后来又有一些天主教士来中国。但他们基本上没有在中国人中间进行福音传道工作,对中国文明也采取宽容和调和的态度,并且,早期的传教活动没有外国军事力量和国际条约的支持,不带有任何的强制性。1682年康熙皇帝曾经正式下旨准许传教,但被雍正皇帝在1724年收回旨意。此后120年间,基督教被官方定位为异端而遭禁止。但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教活动并没有因为官方的禁止而停止,特别是集中在英国和美国的新教徒,由于工业革命给英语世界带来的财富和人们旺盛的活力,他们在华的事业继续发展。他们准备了大批的基督教中文书籍,编辑了英汉字典,兴办医院和学校,努力深入到中国的民间。

基督教在中国的大发展始于鸦片战争。虽然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和西方列强的条约中没有关于基督教的条款,但作为外国人的传教士,他们自然会在条约中获益。比如,在开放的口岸出现了租界,在租界设立教堂就理所当然。治外法权使传教士不受中国法律的管辖,他们即使在内地工作也没有多大危险了。基督教在中国的势力迅速扩大。到1900年,在华的外籍天主教的神父和主教人数达到886名,本地牧师约500名,天主教徒约70余万,教堂、学校、医院和其他慈善机构几千个。新教的传教士团体比天主教更大,影响也不比天主教小。新教传教士特别致力于教育和医药等非传教性质的事业,并积极从事如救荒、戒烟、实施盲哑人教育等广泛的慈善事业。这些事情虽然都是符合基督教义的善事,但传教士们的根本目的是想通过改善老百姓的生活来使得中国人接受基督教。

入教的天主教徒被要求放弃全部“异教徒”的宗教信仰和习俗,不许贩卖和吸食鸦片,不参加民间节日和星期天工作,不纳妾,尤其要放弃祖先崇拜。因为最早的教徒都来自社会最底层的穷人,所以他们能够接受这样的规定,但显然,基督教的传教活动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冲突是极其深刻的,特别是反对祖先崇拜是直接向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挑战,必然引起中国士绅阶级的强烈对抗。于是,基督教传教士及其教徒和基本被士绅阶级控制的中国社会的对抗几乎是难以避免的。

外来的基督教势力自然会利用西方列强和中国的不平等条约的力量来对官方施加压力。这就使得传教活动和帝国主义侵略很难完全区分开来。在一些教徒和非教徒的官司中,由于传教士对衙门施加的压力,衙门做出了偏袒教徒的裁决,加剧了中国教徒和普通中国人之间的摩擦。当然,中国民众中的愚昧和民族偏见也增添了敌对的情绪。从19世纪60年代以后,反基督教的冲突极为普遍。据不完全统计,从19世纪60年代起到19世纪末,全国发生大小教案八百余起。1898年10月下旬,山东冠县梨园屯拳民起义,使义和团运动迅速发展。

1900年春夏之交,中国北方大旱,千里赤地,饿殍遍野。之前,又刚刚发生过黄河决堤的大水灾。从官府到民间普遍认为,这是因为洋人传布异端邪教触犯神灵的结果;还认为洋人建造铁路伤了“龙脉”,开矿放走了山中的“宝气”,破坏了风水。这样的解释,是老百姓很容易接受的。

秘密宗教和民间文化是义和团发动群众的主要工具。民间故事和传统戏剧中的人物,如关云长、姜子牙、黄天霸、孙悟空、二郎神等,都成为义和团信奉的新神。拳师宣传,只要心诚,就可以降神附体,刀枪不入。既然如此,向洋人开战还有什么可害怕的?

中国武术中确有号称“铁布衫”的功夫,从小练成的童子功,对于冷兵器,确实有点刀枪不入的真本事;加上气功,加上精神的力量,加上魔术戏法,在狂热的气氛中,的确会具有神的力量。不但百姓相信,连慈禧太后都派大学士刚毅和赵舒翹前去查看义和团大师兄“刀枪不入”的真伪,得出的结论是确有其事。

应该说,清政府的上层并不都是愚昧糊涂到相信鬼神的地步,但俗

话说病急乱投医。甲午战争以后,面对帝国主义的割地狂潮,中国朝野弥漫着近乎绝望的气氛。忽然出来个据说神通广大的义和团,仿佛溺水者抓住一根稻草,与其信其无,宁可信其有吧。于是,以慈禧为首的清朝统治者利用义和团作为对付洋人的一张牌;当然,转眼,义和团就被朝廷出卖了。写到这里,忽然想起一位学者曾经说过:“就同一种族和传统而言,红卫兵运动和上世纪末的义和团运动有许多相似之处:同样的狂热和盲信,尤其是他们都自认为掌握了某种咒符而战无不胜,并且盲目排外,在使馆区闹事。”对于经历过“文革”的人,的确易产生这样的联想。

3

1900年新年期间,关于义和团的消息流传到北京赫德耳中。但他还没意识到就在这一年,义和团将改变中国的命运。1月26日他给金登干的信中说:

我们这里渡过了欢乐的两周,跳舞、宴会、演戏。我在家里招待了很多,因为我不能出门。我从圣诞节前就一直没有外出过!先是闹了一场感冒,接着又患腰部风湿痛(已经控制住)。冻疮没有起泡就好了,所以油膏虽然没有寄到,也没关系。唉!我越来越感到自己年迈了,青春已经完全逝去!

到了3月,传出了义和团和官员结合的消息。4月6日,英美德法四国公使照会总理衙门,要求清政府在两个月内“剿灭”义和团。而在清政府内部,高层对义和团的态度不统一,采取的措施也各行其是。各列强出于各国不同的利益,亦态度不一。事态就有点不可收拾。清政府虽在五月下旬连续发布三道措辞严厉的上谕,限令:“立即采取行动将义和团首领与头目力予逮捕而驱散其众”,实际上并未能控制局势;或者说,最高当局并不真想控制局势。列强则以保护使馆为名,派兵进入京津地区。局势骤然紧张起来。

赫德也感觉到了义和团的威胁。5月20日他写信说:义和团很活跃,准备胡闹。如果我的妻子和孩子们都在这里,我一定马上把他们送到日本去。我想这个星期公使馆就会有外国兵来警卫,否则总有一天会